《自然科学史研究》 第 44 卷 第 1 期（2025 年）：1—16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Vol. 44 No. 1(2025)

清宫西洋药物西白噶瓜那
——吐根的环球之旅

颜宜葳✉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 要 康熙朝时清宫中出现过一种名为“西白噶瓜那”的西洋药物，实即美洲天然药物吐根。吐根 17 世纪中期由荷兰人在出版物中介绍到欧洲，1672 年开始贩运到法国，其制剂作为治疗痢疾的秘方药风行一时，在法国获得专卖权，被法国和英国的药典收录，又引起法国天主教传教团体的重视，成为前往远东的传教士随身携带的应急药品。积极参与法国海外扩张活动的法国耶稣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会士们将吐根从巴黎辗转带到北京，1699—1704 年的某一时间，它由耶稣会士张诚进献给康熙皇帝。其后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和耶稣会士也曾将它作为礼品贡入宫廷。吐根在清宫至少有两次用作治疗严重痢疾血便的候选药物，颇受珍视，但实际使用率不高。吐根传入中国不是为了应对疾病流行的压力，它 30 余年间环行多半个地球的旅程受到多个历史因素的推动。它之所以未能在清宫广泛应用，与药物本身的物质特性和传入地区的疾病谱构成有关。

关键词 吐根；西洋药物；康熙；法国传教士；药物传播；医学交流；17 世纪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25)01-0001-16

1 引 言

康熙年间，行走宫廷的西洋医生将许多外来药物介绍到中国。([1];[2],24 页;[3-6])其中几种来源成分可考的药品，如秘鲁香胶（拔尔萨摩）、金鸡纳霜、鸦片合剂底野迦等，均得到过学界的专门研究。[7-14]但受到传播方式和语言载体的限制，很多西洋药物仅以音译名称存留在史料中，真实成分仍然少人知晓，一物多名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其中一例即所谓的“圣药”西白噶瓜那，它掌握在康熙皇帝手中。2012 年出版的《清宫医案集

收稿日期：2023-12-26；**修回日期**：2024-08-26。
作者简介：颜宜葳，1962 年生，北京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命科学史，Email：yanyiwei@ihns.ac.cn。
基金项目：此为故宫博物院 2021 年开放课题“清宫医药器物中的多元文化交流与融通”的成果，本课题得到中国青基会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公益资助。

成》一书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档案中辑录了清代宫廷医疗活动的相关记载,其中有一份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奏折,内容是一位郡王罹患重病出现痢疾便血,各种方法都已用尽,御医们上奏皇帝,希望得到"圣药西白噶瓜那"救治病人。([15],24 页) 由此可见,这种药相当珍贵。该书的辑注者陈可冀院士在这一条记载下面特别注明了"圣药西白噶瓜那,疑为西药之满洲语译音,待考",而且"从脉案中看,是当时宫中治疗泻痢的贵重药物"。事实上,此药便是现代医学仍在使用的天然药物吐根①。它伴随着欧洲人的殖民探险,从美洲大陆传入欧洲,到达欧洲的时间比清宫的这次用药记录仅仅早了 30 多年。

2 清宫治痢"圣药"西白噶瓜那

"西白噶瓜那"这种名称奇异的西洋药物在清宫奏折中至少有两次明确的记录。

康熙四十四年, 康熙皇子胤祉在奏折②中提到这一药物,起因是一位身份特殊的老宫女、康熙幼年的满文教师"苏玛拉祖母"患上了严重的痢疾。这位苏玛拉祖母大概从农历八月底起"腹内绞痛,便血,不饮不食,身体消瘦"([15],17 页),康熙推荐了这种西洋药物,朱批道:"尔等细问大夫,若可服用西白噶瓜那,圣主赐予奶奶一种草根,拌以鸡汤服饮,大夫若称不可,即止。"([20],744 页) 农历九月初四,胤祉再次上奏,报告苏玛拉病情加重,但是遵旨询问过大夫,西洋大夫罗得先的看法是"用西白噶瓜那,稍泻呕吐,虽治痢疾,但不可用于年老体弱及虚弱者",最终没有给苏玛拉使用。康熙似乎心有不甘,在朱批里说"若不给服西白噶瓜那,则象看之耽误似的"([20],744 页),看起来他还是颇相信此药的疗效。

康熙四十五年农历六月,信郡王久病不愈,太医院的两名御医诊治之后,认为病因:

> ……系元气素虚,又兼饮食暑湿,复伤胃气,以致泻痢坠重,肠鸣不思饮食,四肢浮肿,精神恍惚,年老病久,下痢紫红血水,甚属不宜……([15],24 页)

因为"其病十分重大",御医们上奏康熙帝,"议讨圣药西白噶瓜那救治"。不过,这种药在信郡王身上的治疗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需要用到"西白噶瓜那"的两次,都是为了治疗严重的痢疾便血。第一件医案里还提到此药是一种"草根",服用时与鸡汤同煮。药物的适应症和生药的形态都与吐根符合。

17 世纪时,吐根在拉丁文、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中的名字就是 ipecacuanha[21],法文的药物书也使用 ipecacuanha 这个字([22],387 页),一般读物中有时会拼成 hipekakuana,或称之为巴西根(Radix Brasiliensis)。[23]英文药典与法文相同,使用 ipecacuanha 称呼这种药。([24],25 页) 无论 hipekakuana 还是 ipecacuanha,读音均与"西白噶瓜那"相类。

---

① 董少新在著作中所附的"清宫外来药物名称一览表"中将"西白噶瓜那"释为吐根(ipecacuanha),但未给出解释的依据([16],251 页)。

② 满文奏折上所标时间是康熙五十年(1711),白雅诗参照杨珍的研究[17],认为这个时间有误,事件实际发生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农历九月十三日[18,19]。白雅诗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因 1705 年苏玛拉去世,且 1711 年农历九月罗德先正随侍康熙皇帝出巡热河,不在京城。

根据奏折中的记载，在决定西白噶瓜那是否适用于对苏玛拉的治疗时，胤祉等人遵康熙旨意“详问”了西洋大夫罗德先。罗德先①（Bernard Rhodes，1646—1715），法国人，耶稣会辅理修士，1699 年进入清宫担任医生。董少新的著作（[16]，227—230 页）和白雅诗（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的中英文论文[18,19]对此人的背景及担任宫廷医生期间的活动都有过介绍。白雅诗的文章还专设一节讨论了罗德先遵旨为西白噶瓜那②的用药方案提供意见一事。白氏 2020 年文章[19]原是她 2017 年英文文章[18]的中译，在英文原文中，凡与“西白嘎果那”对应的地方均写作 ipecacuanha，即吐根在数种欧洲语言里的名字。作者未解释对译的根据，很可能这种药物在她参阅的西文档案材料中本就是以 ipecacuanha 之名出现的。她的中文文章里也没有出现“吐根”这个药名，唯介绍说“西白嘎果那以‘抗痢疾的草根’闻名，是当时欧洲普遍使用的药物。如金鸡纳霜一样，也源自美洲”。这“抗痢疾的草根”自然仍指吐根。

故宫博物院收贮有西白噶瓜那的实物，馆员关雪玲在 2010 年的论著《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25]，59 页）和 2019 年的一篇文章中[26]披露过照片（图 1）。照片中的西白噶瓜那是一些干燥的植物根茎。将它们与现在美洲药物市场上出售的吐根生药（图 2）比较，可知二者外观颇为相似。



图 1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西白噶瓜那（[25]，59 页）



图 2　市售吐根生药[27]

3　美洲天然药物吐根

吐根是具有祛痰或催吐作用的天然药物，原植物③是茜草科头沛木属（*Carapichea*）的矮小灌木（图 3）[28]，间断分布于南美洲和中美洲的热带雨林地带，主要生长在环境潮湿、荫蔽良好的山谷和林下。药用部分为干燥根及根茎。原名 ipe-cac-uanha 源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可以粗略译成“路旁的催吐草”。[29]南美原住民一般所称的“催吐草”（ipe-cac）还包括其他几个不同种属的植物在内。通常作为药用的吐根，其来源植物在不同语言里有众多的俗名和商品名，分类学上的名称也不止一个。在《欧洲药典》（2002、2004）、《联合国药典》（2004）、《不列颠药典》（2003）、《日本药局方》（2001）等各大药典中正式收

① 白文[19]写作罗德贤。
② 白文[19]写作西白嘎果那。
③ 旧归入头九节属（Cephaelis）。

录的两个种属名分别是 *Cephaelis ipecacuanha*(Brotero) A. Richard 和 *Cephaelis acuminata* H. Karst。[28]但后一个学名不见于世界植物分类名录,分类学家也找不到最初采集者取得的模式标本。新近的研究认为这两个种名代表的是同一种植物,归并后的新学名确定为 *Carapichea ipecacuanha*(Brot.) L. Andersson。[30]

吐根主要作用为催吐、镇咳祛痰等,今日多用于治疗儿童的支气管炎,也用于重度腹泻(阿米巴痢疾)和癌症。小剂量下使用可增进食欲,疑似中毒的情况下作为催吐剂口服。活性成分为生物碱,其中吐根碱、吐根酚碱等为主要疗效成分,同时也是毒性成分。吐根刚开始介绍到欧洲时,被人们看作百试百灵的药物,除用于痢疾治疗外,还用于顽固性腹泻、月经过多、白带过多、慢性肠梗阻等各种疾病。([31],270-272 页) 18 世纪的英国医生杜佛(Thomas Dover,? —约 1741)将吐根粉和鸦片混合,辅以其他药物,配成一种称为"陀氏散"(Dover's Powder)的散剂,之后的两百年间一直被广泛用于治疗各种发热疾病。此药在我国也称杜佛氏散或复方吐根散,1957 年尚有人在《药学通报》撰文介绍,称其疗效确切、使用简便,各国的医生无不知之。[32]该药当时收载于许多国家的药典中,被列为法定制剂。巴黎化学学院的科学家马让迪(Magendie)和佩尔蒂埃(Pelletier)在 1817 年鉴定出吐根干燥根茎中含有两种活性很强的生物碱,即吐根碱和吐根酚碱,它们能诱发呕吐和腹泻。19 世纪下半叶发现了痢疾的病原体之一——溶组织内阿米巴(Entamoeba histolytica),让人们认识到痢疾分为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两种不同类型,吐根只对阿米巴痢疾有效。[29]阿米巴痢疾过去和今天在热带国家都是高发疾病,19 世纪派驻在南亚地区和非洲北部的英法军队曾经饱受该病困扰,吐根药粉和吐根碱制剂成为军医在治疗中不可或缺的药品。英国政府则致力于在印度次大陆引入吐根开展规模化的种植。[33] 20 世纪一段时间里,吐根糖浆曾经是每个美国家庭必备的急救药物。但因后来发现吐根有较明显的心肌毒性,吐根糖浆失去了非处方药的地位,今天已有更安全有效的药物将其取代。[34]

4 从南美山谷到西欧药房

巴西的原住民早就了解吐根的药用功效,尤其是它的催吐作用。西方殖民者到达美洲以后,从当地人那里学会了使用吐根,很多年中一直将其作为中毒或儿童误食有害物质时的催吐剂。关于吐根的最早文字记录出现在 1601 年,一名曾在耶稣会开办于巴西的多家医院担任过药剂师的葡萄牙耶稣会士特里斯唐(Manoel Tristão),在他的美洲历史札记手稿中记录了当地人治疗血痢的 3 种药方,其一便是名为 Igpecaya 或 Pecaya、Pigaya 的药根。[35]

吐根的知识传播到欧洲,与荷兰在美洲的殖民活动密切相关。17 世纪,新近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独立出来的荷兰共和国进入黄金时代,金融业和航运业领先世界,贸易网络遍及全球。1621 年成立的荷兰西印度公司(Geoctroyeerde West-Indische Compagnie)为了能够充分插手美洲蔗糖、烟草和苏木的贸易,1624 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巴西东北一隅建立殖民地,经营 30 年,直至 1654 年葡萄牙人将这个地区夺回。"荷属巴西"虽存在时间短暂,却给荷兰人赢得了一笔丰富的文化资产。荷兰驻巴西总督约翰·

莫里茨伯爵(Johan Maurits van Nassau-Siegen)在他任职的 7 年半时间里(1637—1644),从欧洲各地延揽来 40 多位艺术家、科学家、学者、地图测绘师和工匠,这些人调查记录了有关巴西天文、地理、动植物、风光、人种、疾病和土著医药的丰富知识。[36]受莫里茨资助的德国天文学家、博物学家马格拉夫(Georg Marcgraf,1610—1644)编成了多达 8 卷的动物志和植物志,莫里茨的私人医生、德裔荷兰人皮斯(Willem Pies,拉丁化的名字写作 Willem Piso,1611—1678)又添加上自己有关巴西医药的 4 卷,这 12 卷手稿由莫里茨带回荷兰出资印行,于 1648 年以《巴西博物志》[21](*Historia Naturalis Brasiliae*)为名在莱顿(Leiden)出版。这部书是 17 世纪有关南美洲动植物的最详备的科学著作,对于欧洲科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瑞典科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在现代生物分类学的奠基著作《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中,采用了《巴西博物志》对许多南美动植物的描述。[37]

在《巴西博物志》记载的近 400 种植物中,有两种名字均为 ipecacuanha 的治痢疾的草药([21],110 页)。一种是低矮的小草,在开阔的草地上生长,根部颜色发白,另一种有半腕尺①高,根是褐色的,生活在茂密森林里的幽暗场所(图 4)。后一种植物据今人认为就是吐根。[28]两种药草据说都可以催吐和泻下(从上方和下方清除死物质),还能对抗一切毒素。前一种性质温和,后一种则是强效的药物,不仅能通过催吐把非常顽固的腐坏物质从身体驱除出去,还能收敛肠胃,调理胃气,从而止住泻痢,对其他很多疾病也有直接或间接疗效。巴西人将其视为圣药。这种药根很耐贮存,虽经多年收藏,效力并不减弱。

耶稣会士将痢疾特效药"秘鲁树皮"(金鸡纳树皮)带回欧洲后,"特效药"的概念开始在西方医学理论中占据越来越显著的位置。在传统的盖仑医学体系中,疾病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人体内整套系统的运行偏离了常态,它的表现方式受制于每个人的体质、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因此没有哪两个人能够罹患同样的疾病。"特效药"的概念出现后,疾病开始被看成相对独立的实体,它可以通过特定的症状群辨认出来,并且有希望找到专门针对它的药物。[38]金鸡纳树皮让欧洲人燃起了找到更多特效药的热切期望,这种心态为吐根一类外来药物的输入做了准备。

1672 年,法国医生拉格拉斯(La Gras)从南美运进一批吐根到巴黎,人们开始用它治疗痢疾和发热疾病。由于市场供应量有限,使用者不多。直到 1680 年,熟知吐根药效的巴黎商人格勒尼耶(Garnier)从巴西一次进口了 150 磅吐根,不少医生有了试用这种新药的机会。学院医生阿福蒂(François Afforty)为一名药商提供过服务,药商支付报酬的时候,用几磅吐根抵扣一部分现金,这批药落到了阿福蒂的助手埃尔维修手里。[39]

埃尔维修(Adrien Helvétius,1662—1727)是荷兰人,不久前只身来到巴黎寻找事业机会,他年纪尚轻,资历又浅,其医学博士文凭得自法国兰斯学院(Faculty Reims)。这所医学院当时在法国医学界评价不太高,很多医生批评校方标准松懈,经常把学位授给没有在该院实际学习过的人。([40],493-494 页) 但埃尔维修的父亲是荷兰名医,与一些法国贵族素有交往。埃尔维修凭借父亲的关系,在巴黎结交了一些上流社会的主顾。这些人中有两位曾罹患重病,经多名医生诊治无效,埃尔维修治愈了他们。这两次成功为他打开

① 腕尺(cubit),又译肘尺,欧洲旧时一种长度测量单位,相当于成年男性自肘到中指指尖的距离,约合 17—22 英寸。17 世纪时通常认定为 18 英寸,即 1 腕尺 = 45.7 cm。

了更多权贵人家的大门。这些有权有势的庇护者中间就有当朝首相柯尔伯(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和国王的忏悔神父、耶稣会士拉雪兹(François de la Chaise,1624—1709)。[23]



图 3 吐根标本图[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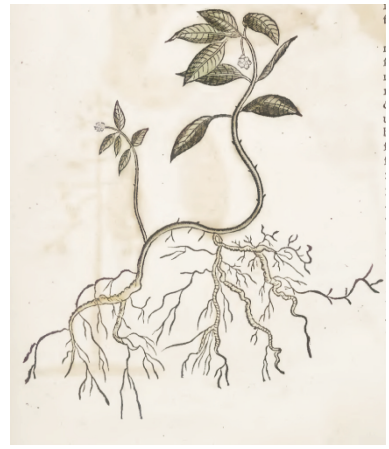


图 4 《巴西博物志》中生长在林下的催吐草([21],110 页)

埃尔维修拿到吐根后,改变以往医生们大剂量给药的方法,使用较小的剂量治疗痢疾病人,取得出乎意料的效果。据说 1686 年他专门印制广告单让人贴到巴黎街头,声称他有了一种非常成功的新疗法。同时,他继续通过药商格勒尼耶大量购入巴西吐根,当作他的秘方药物在巴黎售卖。[42]

1687 年,埃尔维修用他的新方法治好了法国皇太子的痢疾,愈益得到皇室重视。1687 年 7 月,他获得皇家批准,在巴黎最大的两个医院巴黎总医院(Hôpital Général)和主宫医院(Hôtel-Dieu)的穷苦病人身上试用他的新疗法。国王派御医监察他的治疗,结论是试验很成功。经过谈判,朝廷以 1 000 金路易的价格购买了埃尔维修的秘方。1688 年 8 月 23 日,埃尔维修获得法王颁发的 15 年专卖权,独家出售他的"专治腹泻、便血和痢疾的秘方药物",每打兰(drachme)①药粉的价格高达 3 个金路易。[39]

一开始,埃尔维修对他的"特效药粉"的真实成分避而不谈。1688 年他出版了一本宣传小册子,其中全文刊登了皇家的特许状,但只字未提药方的组分,只是把他售卖的药物分为 A、B、C 等不同的配方,在书中设计了一套复杂的疗程,轮流服用这几种方剂。不过,巴黎医学界很快就流传开了有关药物真实成分的消息,先后有几个信誉良好的药商站出来质疑埃尔维修声称的优先权,也有人为此将埃尔维修告上法庭。他们说早在埃尔维修来到巴黎之前,已经有不止一个人了解吐根的药效。因为药商自己没有处方权,所以其中一人曾委托有医师资格的埃尔维修书写处方,以便售卖药物。后者由此才得知了吐根的用法。不过这些指责和诉讼最终都没有结果,埃尔维修独占了吐根在法国的销售。[39]

16—17 世纪,法国皇室为了增强国力及与新教势力争夺民心,也为了应对反复来袭的鼠疫,十分注重慈善事业。王家与天主教会联手,在各个教区分发慈善救济物资,并接

① 药衡,1 打兰 = 3.824 克(法制)或 3.888 克(英制)。

管和翻新各地破败的民营医院，管控范围从巴黎向外省不断延伸。设在全国各地的医院和救济院是慈善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当时的医院其实兼有济贫院的性质，收留的一般是穷苦无依的患者，也包括伤残退伍的老兵。皇家时常出资购置些药品供给这些慈善机构。（[43]，215—238 页）获得专卖权的埃尔维修在这些交易中成为吐根的唯一供应商，药粉经他之手源源不断地流向各地的慈善医院。

埃尔维修获得吐根专卖权不过月余，法国卷入了九年战争（1688—1697，又称奥格斯堡同盟战争，War of the League of Augsburg）。战争期间，法国军队爆发了大规模的痢疾流行，秘方药粉变成军医院的标准配置，销量扶摇直上。九年战争结束后，埃尔维修说服皇室，正式把军医院药品的采购和分发确立为有章可循的制度，除金鸡纳霜之外，他自己的秘方药粉也是采购对象。吐根粉的销量从此再度提升。[44]

吐根在法国快速打开销路，是当时欧洲医学界谈论的话题。一名英国医生给伦敦皇家医师协会（College of Physicians in London）会长写信宣扬吐根的益处，他举出几个用吐根治疗泻痢的成功例子，又说，一位苏格兰医生也曾向他讲述过自己如何用吐根挽救了很多濒临死亡的儿童。这名英国医生的信以《有关从印度输入的巴西根的若干观察记录，显示其对抗吐泻的奇妙功效》（*Some observations made upon the Brasillian root, shewing its wonderful virtue against vomiting and looseness*）为题，印成单册出版①，册子的末尾提到：

> 我记得很清楚，斯卡伯勒爵士②（Sir Charles Scarborough）告诉过我，法国的一个医生运用此药，收效非同小可，他把它作为秘密保守了很久的时间，后来人们得知这药物对于所有各种痢疾都是如此有效，那个国家的国务秘书便下达了命令，要求给在医院和军队供职的所有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配备这种药品。（[46]，5 页）

1698 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登载了学会秘书斯隆（Hans Sloan，1660—1753）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一篇讲述“药粉”用法的文章，其中披露了埃尔维修秘方的几种不同配伍方式，其实不过是：吐根与桂皮共研细末、吐根与大黄共研细末、吐根与肉蔻共研细末、吐根与桂皮和肉蔻共研细末。一个疗程里面各配方轮换使用，用肉汤、葡萄酒或药草茶调服。[47]

当时法兰西王国尚未颁行过具备法律效力的国家药典。全国药剂师在调配药品的时候都以拉丁文的《巴黎药典》（*Codex medicamentarius seu phamacopoea parisiensis*，1638 年首版）作为准绳。同时，他们也频繁参考两部法文药典，即皇家植物园化学家谢拉（Moyse Charas，1619—1698）的《皇家药典：盖仑制剂与化学制剂》（*Pharmacopée royale galénique et chymique*，1692 年首版）和巴黎医生兼药剂师莱默里（Nicolas Lémery，1645—1715）的《通用药典》（*Pharmacopée Universelle*，1697 年首版）。[48] 在后两部书出版的年代，吐根已经在法国广泛使用，但没有立即进入这两本准官方的药典。不过，莱默里 1698 年又出版了一部《单味药通论》（*Traité universel des drogues simples*），它改变了《通用药典》里有方有论的

---

① 单册封面所印的出版日期是 1682 年，恐误。多个来源的材料都说明信中所述的事件均发生在 1686 年之后。目前能查阅到的同一作者（John Peachie）以“*Some observations made upon ... shewing ...*”为题的单册基本都出版于 1694 或 1695 年。

② 斯卡伯勒爵士（Sir Charles Scarborough，1615—1694），英国医生、数学家，担任过英国斯图亚特王室前后几任国王的御医。见英国皇家医学会网站介绍。[45]

编写形式,仅将书中收录的每一品药物择取出来,解释它们的来源和药性,分辨异同,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条目,编成易于检索的药物志。《单味药通论》收入了吐根,并将当时市面上的吐根分为褐、灰、白 3 种,认为它们的区别在于药效强弱不同。([22],387-388 页)书中说:

> 这种根既泻下又收敛;它最易溶的成分向上方或向下方起到清除作用;它的土性成分增强和加固肠胃的筋脉。对于痢疾,它是我们所知的最好、疗效最确切的药之一:它也能止住其他种类的肠胃病,但没有那么见效。捣成细粉后,它的剂量是半打兰到一个半打兰。
>
> 灰色吐根的用量可较褐色吐根略多。
>
> 白色吐根是 3 种当中最为温和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当孕妇和幼儿患痢疾时使用这一种。([22],388 页)

莱默里的《通用药典》影响极广,初版印行后的 3 年之内便以法文重印 9 次,以英文出版 3 次,还出现了若干拉丁文版本。1700 年,有人将《通用药典》和《单味药通论》编译在一起,在伦敦出版了一个英文节译本《简明莱默里药典》(*Pharmacopoeia Lemeriana Contracta*)。这本英文药典收入《单味药通论》有关吐根的部分([24],24-25 页),还为它配上插图(图 5)。图中植物各部分的比例其实不很准确,5 瓣的花朵也画成了 4 瓣。不过这些英法文书籍的出版,表明吐根开始得到欧洲主流医学界的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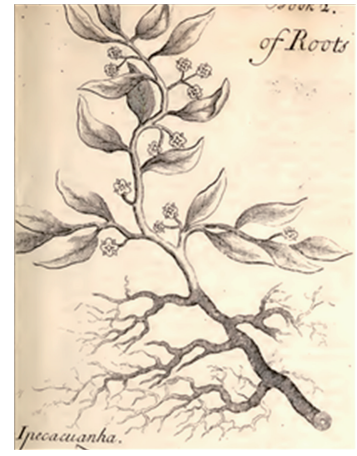


图 5 《简明莱默里药典》中的吐根插图([24],24 页)

17 世纪末年,吐根已成为巴黎市面上最常见的药物。这一方面得益于埃尔维修推销有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痢疾流行异常猖獗。时任英国皇家学会副秘书长的著名医生李斯特(Martin Lister,1639—1712)1698 年携家人游览巴黎,甫一抵达,他们就“受到了足够的警告,说河水是如何的不健康,提醒我们不可饮用它”([49],72 页)。虽然倍加小心,李斯特的家人中还是有三分之二患上了腹泻,其中几人还是很严重的痢疾,“从偏远外省来到这里的法国人也和外国人病得一样厉害”([49],72 页)。李斯特说,吐根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

> 痢疾既是巴黎最常见的疾病之一,现在治疗它的最受称赞的药物就是吐根了;尽管我从没给自己国家的人用过这种药,而是使用我们通常的药物,也同样快同样好地治愈了每一个人。在这里他们确实对吐根有极大的需求,因为那些比较贫穷的人,吃得很差,也因这种河水和草药的缘故,他们都非常容易患上痢疾;据说吐根治这种病就像耶稣会士树皮治疗疟疾一样方便而且效果确定;这一点医生和药剂师们无不同意。他们给药时用 10 谷(grain)[①]到 40 谷的药粉,40 谷是最大的剂量。它通常引发呕吐,有时也能泻下,但都很温和。它在此地的售价每磅从 20 克朗(crown)到 50 克朗。人们按照品质将它分为四类。([49],72 页)

李斯特一家人靠着饮用专门供应宫廷的清洁泉水来避免染病。他说:“虽有人告诉

① 欧美旧时重量最小单位。药衡 1 谷 = 0.0531 克(法制)或 0.0648 克(英制)。

我们将饮用水煮沸是一个好对策，可以除去它那种引发肠绞痛的性质，但这只是一种空想，因为我们都知道，含矿物质的水烧开后效果变得更强，而它致痛的性质恰恰来源于此。”（[49]，72 页）李斯特在当时是享誉英法的名医，他尚且认为饮用水煮沸有害无益，普通人饮用生水大概更是习以为常。这种生活习惯和卫生条件，无可避免地会加剧胃肠道传染病的流行。吐根从 1698 年开始，逐渐进入重要的法文和英文药书，其地位的提升与当时痢疾肆虐的状况恐怕不无关系。

多方的力量推动着吐根前进：欧洲人“地理大发现”打开的输入途径、医学思想的变革、洲际贸易和国内垄断经营建立起来的流通渠道、国家军事行动和王室慈善事业拓展开的市场、肠道传染病流行激发出的对药品的迫切需求。种种因素形成合力，让这一株美洲小草从土著居民的传统草药一步步演变成了欧洲药房里的高价商品。

5　从凡尔赛宫到紫禁城

白雅诗在研究西洋医生罗德先清宫活动的过程中，查找档案时发现了一封耶稣会士孟正气（Jean Domenge，1666—1735）1704 年写给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派驻四川的传教士白日升（Jean Basset，1662—1707）的信件。信中记载，西白噶瓜那已由法国耶稣会士张诚（Jean 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等人进献给康熙。（[18]，225 页脚注 80；[19]，150 页脚注 1）

张诚是 1685 年法王派遣来华的 6 位“国王数学家”之一。[50] 法国在同葡萄牙和西班牙争夺海上贸易份额、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与暹罗（今泰国）建立了良好关系，法王当时有意通过暹罗这个中转站，与中国建立更直接的交往。同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刚刚经历了杨光先挑起的历狱，苦心经营的传教事业前景黯淡，且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康熙帝的御前科学顾问、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1678 年向欧洲寄回公开信，呼吁增派耶稣会士来华。法国皇家科学院此时正在计划派人去到东方各地进行天文观测，中国也是预想中的目的地之一。路易十四抓住这个机会，委派拉雪兹神父在法国的耶稣会中挑选了 6 名会士，以资深数学家洪若①（Jean de Fontaney，1643—1710）为首，组成赴华传教团，借着到东方进行天文观测的名义，假道暹罗前往中国。为了避免与葡萄牙的“保教权”发生冲突，法王在这些人临行前授予他们“国王数学家”的称号，让他们能够以法国皇家科学院成员的身份出行。传教团与法王向暹罗派出的首个使团同乘一船，1685 年 3 月动身，同年 9 月到达暹罗。6 位“国王数学家”除了洪若和张诚之外，还有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和塔夏尔（Guy Tachard，1648—1712）。前 5 人于 1687 年 6 月搭乘中国商船北上，7 月到达宁波，1688 年 2 月到达北京，获得康熙皇帝的接见。②

---

① 此人中文名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本[51] 和《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52] 等著作以及大多数研究文章中恒记为洪若翰。然承蒙韩琦教授相告，经他遍检康熙朝的原始记载，Fontaney 的中文姓名在各处出现时均作“洪若”，并无末尾之“翰”字。今据韩氏最新研究成果复其原名。

② 关于此一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在中西科学交流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史学界已经多有探讨，其中韩琦的研究尤为全面深入。（[1]；[53]，155-160 页；[54-57]）

首相柯尔伯和国王的忏悔神父拉雪兹都热心推动耶稣会士来华,这二人也都是埃尔维修在巴黎的庇护人。拉雪兹神父曾要求埃尔维修提供一些秘方药粉,让将要随第二次法国赴暹罗使团出行的耶稣会士贝兹(Bèze)神父带到境外试用,并承诺对药物成分保守秘密。拉雪兹购买了 4 磅“药粉”交给出行的耶稣会士。传回法国的报告说,这种药物疗效出奇地好。使团的报告加上埃尔维修治疗皇太子痢疾取得的成功,让拉雪兹决定亲自向路易十四推荐吐根药粉,也正是因为拉雪兹的引荐,巴黎总医院和主宫医院才同意给予埃尔维修试用新药物的机会,他因此获得了吐根的专卖权([23],53 页;[58],337—339 页)。

法国派出的第二次赴暹罗使团缘起于塔夏尔在巴黎进行的游说活动。塔夏尔 1685 年到暹罗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法暹之间的外交事务,试图通过这条途径促进天主教在暹罗的传播。1685 年 12 月,其他 5 名国王数学家还在等待前往中国的机会,塔夏尔却带着暹罗国王派出的 3 名使臣,随同返航的法国使团踏上了回程。在巴黎,他成功说服法王对暹罗加强贸易和军事扩张。[59] 1687 年塔夏尔跟随法王为此目的派出的规模庞大的使团再次东行,同行的还有他应暹罗国王请求而招募的 14 名耶稣会士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贝兹神父也在其中。([60],3 页) 贝兹在写回法国的信中说,他们的舰队行驶到北纬 30 度左右,全体人员已经饱受发热、坏血病和“肠炎”的折磨,疾病导致一半人卧床不起。([60],36 页)不过一些耶稣会士在到达开普敦(Cape Town)之前已被治好,贝兹在治疗过程中也出了一份力,他拿出了海军参谋长临行前赠送给他的药品和“埃尔维修先生与太阳王的兄弟交到我(贝兹)手中的秘方药”([58],340 页;[60],51 页)。“太阳王的兄弟”指路易十四的异母弟奥尔良公爵,埃尔维修当时是他的私人医生([58],340 页)。所以,耶稣会士在航程中已经实地试验过了吐根粉的作用。但是这次带到远东的吐根应该没有来得及继续送往中国,因为塔夏尔一行 1687 年 9 月方才到达暹罗[59],而洪若、张诚等人在 6 月份已经先行离开了。

1688 年塔夏尔以暹罗国王特使的身份再次返回欧洲,1690 年他第三次东行的旅途带上了另外 7 名耶稣会士,其中包括后来为苏玛拉的治疗方案提供意见的法国人罗德先。罗德先继续去往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erry)工作。法国耶稣会此时正在积极物色通晓医药的人以送往清廷效力,洪若、张诚和白晋都给塔夏尔写过信,请求他选派一名精于放血技术并熟悉化学的药剂师来北京,塔夏尔选中了罗德先。但 1693 年荷兰人攻陷本地治里,罗德先作为战俘被遣返回欧洲,没能立即前往中国。[18,19]

我们从耶稣会士孟正气的信里得知吐根实际运抵中国的消息[18,19]。带领孟正气来华的人是另一位国王数学家白晋。白晋与张诚同在宫中供职,他经常向康熙帝介绍法国科学院的情况,据说康熙因此起意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的机构。([57],93 页;[61],26-28 页) 虽然此说可能是白晋为了迎合路易十四的喜好而杜撰出来的[55],但 1693 年白晋确曾以清帝特使的身份返回法国,主要目的是招募一批有学识的耶稣会士。孟正气便是他这一次招募到的人员之一。1698 年 3 月,白晋等人分乘不同船只出发,在孟加拉西部与 1697 年 11 月先期出发的罗德先汇合,一行人经历漫长曲折的航程,1699 年 7 月到达厦门。([19];[62],94-95 页)

那个时代往来中法之间的人员少之又少,天主教会在巴黎购买的物资,包括药品吐

根，交由白晋这批人带到中国是顺理成章的安排。但为什么孟正气要在写给白日升的信里特别报告这件事？这说明还有白日升所属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牵涉其中。

巴黎外方传教会原是罗马教廷为了遏制葡萄牙的保教权，直接掌控远东传教活动而策划和催生的一个传教团体。该会 1658—1663 年在巴黎成立，由世俗神父组成，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传信部，其人员和财政支持则来自法国国王和法国的天主教会。[63,64] 该会 1662 年进入暹罗后，一度成为法暹外交的主要斡旋者，暹罗也成为该会在远东的传教中心。[65]

看来，初到东南亚的法国传教士极易受到肠道传染病侵袭，外方会经常从埃尔维修处采购吐根粉寄往远东。例如，1693 年，时任南京和暹罗宗座代牧的拉诺神父（Louis Laneau，1637—1697）从暹罗写信回巴黎，报告他收到了外方会总部为派驻阿瑜陀耶（Ayutthaya，一译大城府，时为暹罗王国首都）的传教士配备的埃尔维修“秘方药粉”。信中说：

> 假如这个药方真是像标记的那样万无一失，那它正是我们在这些国家所需要的，此地这类病发作很频繁，时间拖得很长，经常致命。每一名传教士在没配备这种药的时候都不应该上路，因为就算药品价值不菲，传教士旅行的花费和他的生命所值更多。（[58]，325 页）

1689 年，埃尔维修获得在巴黎的专卖权之后，开始批量向外方会供应吐根粉，最早一批药粉的目的地便是暹罗。其后几十年里该会的来往信件中时不时会提到吐根粉，它的寄送范围也从泰国扩大到东京（Tonkin，指越南北部）、交趾支那（cochinchina，指越南南部）和本地治里。外方会为采购药粉花费不菲，例如，1689 年 5 月一次采购的金额大约相当于该会雇用的一名外科医生 14 年的工资。拉诺神父为此曾给埃尔维修写信，请求他发扬平时施医送药的慈善精神，给外方会开出低廉一些的药价。（[58]，340—343 页）

孟正气那封信的收件人白日升 1685 年被外方会派往暹罗，与耶稣会的 6 名“国王数学家”同乘一船，跟随法国使团出发。[66] 此后 4 年间他在暹罗、印度等地工作，1689 年底进入中国。当时外方会的活动区域限于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西等几个省份，白日升先到广东，在韶州和广州的教区生活了 12 年，1701 年底接受外方会的紧急委派，束装入川，准备在四川开辟新的传教区。一开始，白日升在疏通当地官员的过程中到处碰壁，直到 1703 年，靠着川陕甘总督华显出面关照，他得以在成都买地修建教堂，1704 年四川巡抚能泰又收到权臣明珠从北京寄来的举荐天主教神父入川传教的推荐书，白日升的传教活动终于得以顺利展开。[67]

华显和明珠给白日升的活动提供方便，都是因为背后有耶稣会士张诚从中说项。[65] 外方会与法国耶稣会效忠对象不同，在争夺传教领导权方面针锋相对，但在对抗葡萄牙“保教权”的问题上又有一致立场[67]。外方会入华较晚，人手不足[69]，在很多事情上倚赖来华更早实力雄厚的本国耶稣会士提携。张诚在法国耶稣会士中是为首的人物，1699 年被耶稣会总会任命为法国耶稣会北京会院院长，1700 年又成为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团体总会长（[62]，94-95 页），并且他受到康熙的宠遇，经常出入内廷。据他自己说他为外方会帮过很多忙。1701 年他在写给在巴黎一位耶稣会士的信中说：

> 外方传教会修院①的先生们对我们可不太公正。自从我们到中国以后，就不断

① 指位于巴黎的外方传教会修院（Séminaire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为该会总部所在。[61]

帮助和照顾他们的传教士,如果我们不为他们提供推荐信,他们可能很难保住自己的传教士,也很难拥有其他传教士所拥有的自由;我手上还有他们写给我的很多感谢信,这些信件足以证明我们为他们所提供的帮助……([62],112 页)

所以,献给康熙帝的吐根有可能是外方会出资采购,耶稣会士带往中国,白日升收到后转赠给张诚表示谢意的。再有一种可能,是白日升本也有向皇帝进献吐根的打算,但自己觐见无门,只得让张诚代献。这一时期埃尔维修秘方药粉的真实成分已经公开,外方传教会不再采购成药,改买更易储存和运输的药材原根。故宫现存的药物可以证实这一点。

由于孟正气信件收藏于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笔者无法得知更多细节,目前能够确定的只是:吐根进入清宫的过程与 17 世纪法国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紧密相联,它本是耶稣会和外方会为派遣东方的传教士配备的护身药品,不知因为什么契机,在 1699 到 1704 年之间的某个时间,变成了邀取中国帝王欢心的礼物。

6 后续进入清宫的吐根

大约 1699—1704 年间献入清宫的吐根很快便投入使用,1705 年在苏玛拉的治疗方案中出现。从奏折记载来看,康熙对吐根的疗效是信服的,太医们对它亦有耳闻,当治疗血痢的手段穷尽之时,他们上奏皇帝,议讨这一剂"圣药"。不过,与其他一些西药相比,尤其是与康熙极其重视、屡次赏赐臣下的金鸡纳霜相比,西白噶瓜那的使用频率看起来并不高。医案中的使用记录限于两位皇亲国戚,而且两人都已到了病势危笃的关头。尽管如此,它毕竟是皇帝御赐钦点过的药品,在华的欧洲人恐怕是探听到了这些消息。澳门的葡萄牙人后来在向清廷进献礼物时,便把吐根纳入礼品清单。

1714 年康熙六十大寿,葡萄牙在远东的传教基地澳门圣保禄学院得到在京耶稣会士的授意,进献了包括药物在内的各种礼品,药物里有烧伤药、烟草、酒、保心石、金鸡纳、底野迦、各种吐根、阿魏、树脂等制剂,以及各种药膏、糖浆。([16],114 页)

1718 年农历三月,澳门总督代表当地议事会为感谢清廷不禁止澳门葡人前往南洋贸易,呈函一封,并备礼一份,由两广总督转交。[5,70] 礼品中除一些西洋糖果烟酒布匹之外,还有几种药品,包括秘鲁金鸡纳皮一箱、极好之膏药止痛药等一箱、白葡萄酒酒石一箱、波斯树脂一箱和"吐根制剂一锡箱"。([70],94 页)

吐根在澳门可能已成为医院的常备药。1726 年,一名葡萄牙耶稣会士在经过澳门时身患重病,澳门议事会聘请的常驻医师弗莱芒人范德蒙德(Jacob Francisco Vandermond)用吐根将他治愈了。这名耶稣会士在写给一名葡萄牙医生的信中说:"除上帝之外,是吐根救了我的命。"([16],102 页)

康熙朝以后,吐根的贡入和使用多半也就终结了。至嘉庆年间,皇帝以宫中旧存的西洋贡药赏赐大臣,清人吴振棫记载这些药是"皆康熙间贡入者,年久未详其用。"([5];[72],259 页) 受赐大臣中有户部侍郎姚文田。后来,姚文田之子姚衡在《寒秀草堂笔记》中详细记录了其父当时得到的药品,其中包括"西白噶瓜那四斤九两五钱 ",并注明是"一瓷瓶。一匣。治痢疾"([73],63 页)。姚文田一人便获赐近 5 斤吐根,可知当时宫中存量尚有不少,只是它们均系康熙一朝收入,后来大概也没有消耗过,到了嘉庆年间,一般

人已经“未详其用”,仅余下姚衡书中“治痢疾”的简化之至的认识。

7　结　语

吐根传入中国,不是为了应对疾病流行的压力。它从美洲到欧洲又到亚洲的环球旅程,借助了大航海时代一系列彼此并无直接因果关系的历史事件和趋势。吐根身处其中,只是一个搭乘顺风车的微末角色。它乘车的身份是治痢药物,往往又不止于此,它还充当过荷兰殖民者探险考察的战利品、商人远洋贩运的奇货、新晋医生博取名望的筹码、法国王室的慈善救济品和军需补给、法国天主教会在华扩展势力的敲门砖、葡萄牙传教士和商人向清廷表示忠顺的贡物。每一个新的身份带动它前进一程。它 1672 年从美洲运抵欧洲,至迟 1704 年便通过了紫禁城的门阙,环绕多半个地球仅用了 30 余年时间。在靠风帆动力航行的时代,这个移动速度不可谓不迅疾。

但不论有多少因素在后面推动,药物的传播过程毕竟受到它自身物质性的制约,这既包括药品的功能主治,也受限于传入地区疾病谱的构成。中国人,尤其是城镇居民,多数有饮茶和饮开水的习惯,很少会像 17 世纪末的巴黎居民那样,因饮用生水造成大规模的痢疾流行。而且吐根治痢疾没有金鸡纳治疟疾那样的神奇效果,后者是治疟疾的特效药,尤其对于控制急性期的症状几乎是立竿见影,而吐根只对阿米巴痢疾有效,对于细菌性痢疾并没有明显作用。在病原菌学说 19 世纪创立之前,人们无法根据致病微生物区分开两种类型的痢疾,所以使用吐根的结果只能是时而效验时而不效。这种不确定性,再加上药物本身的昂贵和稀少以及同时期中医在痢疾治疗方面拥有的丰富手段,让吐根表现不出太大的优势。它在清宫的露面只是昙花一现,今天恐怕已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种药物在 300 多年前曾经一度输入中国。

吐根在栽培条件下繁殖不易,中国目前对吐根药材的需求全部依赖进口,国内未有大规模种植,药品市场上的吐根都是直接购自美洲的制剂。不过,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近期在吐根引种繁殖及栽培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突破。[74] 协和医学院是近代中外医学交流的产物,历经 110 余年建设,已经是中国医学界当之无愧的标杆。这次吐根经由协和人的努力在中国土地上实现推广种植,初看虽然与 3 个世纪前的清宫药物无甚关系,但若从全球医学交流史、尤其是药物传播史的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在吐根传入中国的故事里面续写了新的一篇。

致　谢　本文初稿完成后,复蒙香港理工大学韩琦教授指点参考文献,并以己之最新研究成果示我,笔者受惠良多,谨表衷心谢意。

参　考　文　献

[1] 潘吉星. 康熙帝与西洋科学[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4, 3(2): 177-188.

[2] 韩琦. 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3] 关雪玲. 康熙朝宫廷中的西洋医事活动[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4(1): 99-111.

[4] HANSON M E. Jesuits and Medicine in the Kangxi Court(1662—1722)[J]. *Pacific Rim Report*, 2007, 43: 1-10.
[5] 关雪玲. 康熙时期西洋医学在清宫中传播问题的再考察[J]. 故宫学术季刊, 2012, 30(1): 135-160.
[6] 白雅诗. 康熙宫廷耶稣会士医学: 皇帝的网络与赞助[J]. 董建中, 译. 清史研究, 2014, 93(1): 1-27.
[7] 张碧君. 康熙与"金鸡纳霜"[J]. 北京档案, 1999(3): 40-41.
[8] 王纪潮. 底也迦考——含鸦片合方始传中国的问题[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6, 25 (2): 139-148.
[9] NAPPI C. Bolatu's Pharmacy Theriac in Early Modern China[J]. *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9, 14 (6): 737-764.
[10] 刘世珣. 底野迦的再现: 康熙年间宫廷西药德里鸦噶初探[J]. 清史研究, 2014, (3): 12-19, 148.
[11] 陈明. "阿勃参"与"拔尔撒摩"——中外药物交流之长时段考察例证[J]. 汉学研究, 2016, 34 (3): 161-203.
[12] 潘大为. 知识与权力的传奇——康熙与金鸡纳史实考辨[J]. 科学文化评论, 2016, 13 (1): 88-101.
[13] SCHOTTENHAMMER A. "Peruvian Balsam": An Example of Transoceanic Transfer of Medicinal Knowledge[J]. *Journal of Ethnobiology and Ethnomedicine*, 2020, 16 (1): 69.
[14] 郑海鑫. 金鸡纳: 中西交流的历史见证[J]. 中国档案, 2022(7): 84-85.
[15] 陈可冀,主编. 清宫医案集成(上册)[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16] 董少新. 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7] YANG Z. Sumala Gu[C] //LEE, L X H, LAU C, STEFANOWSKA A D,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V. 1: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London: Routledge, 2015.
[18] PUENTE-BALLESTEROS B.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Bernard Rhodes S. J. (1646—1715), Physician, Surgeon and Insignis Pharmacopeus: Deciphering Medical Itineraries in Qing China[C]//JAMI C, ed. *Individual Itineraries and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China, 17th—20th Centuries*.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2017: 209-240.
[19] 白雅诗,著. 王学深,译. 医生、手术师与"杰出的药剂师": 罗德贤生平研究——破译清初一位耶稣会士的行医旅程[J]. 中华医史杂志, 2020, 50 (3): 143-156.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21] PISO W, MARCGRAVE G. *Historia Naturalis Brasiliae*[M]. Leiden: Franciscus Hackium, 1648.
[22] LÉMERY N. *Traité universel des drogues simples*[M]. Paris: L. d'Houry, 1698.
[23] D'ARGONNE B. *Melanges d'histoire et de litterature*[M]. Paris: C. Prudhomme, 1713.
[24] LÉMERY N. *Pharmacopoeia Lemeriana contracta*[M]. London: Printed for Walter Kettilby, 1700.
[25] 关雪玲. 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10.
[26] 关雪玲. 清宫中的西洋医生[J]. 紫禁城, 2019(11): 72-83.
[27] SODERLUND B. *Soderlund Drugstore Museum: Ipecac*[EB]. [2023-12-01]. http: //www.drugstoremuseum.org/pharmacognosy/ipecac/.
[28] MONDAL S, MOKTAN S. A Paradoxically Significant Medicinal Plant *Carapichea Ipecacuanha*: A Review[J]. *Indi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20, 54 (2s): s56-s66.
[29] LEE M R. Ipecacuanha: The South American Vomiting Root[J].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Edinburgh*, 2008, 38 (4): 355-360.
[30] DE BOER H J, THULIN, M. Lectotypification of *Callicocca Ipecacuanh*a Brot. And Neotypification of *Cephaelis Acuminata* H. Karst., with Reference to the Drug Ipecac[J]. *Taxon*, 2005, 54 (4): 1080-1082.
[31] MANN R D. *Modern Drug Use: An Enqui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M]. Hingham, MA, USA: MTP Press, 1984.
[32] 李庆华. 复方吐根散和复方樟脑酊[J]. 药学通报, 1957, 5 (3): 117-119.
[33] RAMAN R, RAMAN A. Amoebic Dysentery and Introduction of Emetine Source *Carapichea Ipecacacuanha* into Indian Subcontinent[J]. *Indian 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 2017, 52 (1): 54-65.
[34] SHANNON M. The Demise of Ipecac[J]. *Pediatrics*, 2003, 112 (5): 1180-1181.
[35] ANONYMOUS. Ipecac—Three Centuries of Controvers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1971, 11 (1): 6-8.
[36] WHITEHEAD P J P. The Original Drawings for the *Historia Naturalis Brasiliae* of Piso and Marcgrave (1648)[J]. *Jour-*

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Bibliography of Natural History, 1976, 7: 409-422.

[37] ALCANTARA-RODRIGUEZ M, FRANÇOZO M, VAN ANDEL T. Plant Knowledge in the Historia Naturalis Brasiliae (1648): Retentions of Seventeenth-Century Plant Use in Brazil[J]. *Economic Botany*, 2019, 73 (3): 390-404.

[38] COOK H J. Markets and Cultures: Medical Specifics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Body in Early Modern Europe[J].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011, 21: 123-145.

[39] SPARY E C. Publishing Virtue: Medical Entrepreneurship and Reput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J]. *Centaurus*, 2020, 62 (3): 498-521.

[40] BROCKLISS L, JONES C. *The Medical World of Early Modern Fran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1] LLOYD J U. Cephaelis Ipecacuanha[J]. *The Western Druggist*, 1897, 19 (8): 346-350.

[42] FLÜCKIGER F A, HANBURY D. Radix Ipecacuanhae[C]//FLÜCKIGER F A, HANBURY D, eds. *Pharmacographia: A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 Drugs of Vegetable Origin Met with in Great Britain and British Indi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9: 370-376.

[43] JONES C. Perspectives on Poor Relief, Health Care an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in France[C]//GRELL O P, CUNNINGHAM A, eds. *Health Care and Poor Relief in Counter-Reformation Europ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215-238.

[44] RIVEST J. Secret Remedies and the Medical Needs of the French State: The Career of Adrien Helvétius, 1662—1727[J].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2016, 51 (3): 473-499.

[45] MUNK W. *Sir Charles Scarburgh*[EB]. [2023-07-29]. https://history.rcplondon.ac.uk/inspiring-physicians/sir-charles-scarburgh.

[46] PEACHIE J. *Some Observations Made Upon the Brasillian Root, Called Ipepocoanha*[M]. London: [s.n.], 1682.

[47] SLOANE H. Of the Use of the Root Ipecacuanha[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1698, 20 (238): 69-79.

[48] LAFONT O. *A Stroll through the Collections of Pharmacopoeias of the Order of Pharmacists in Paris*[EB]. [2023-05-27]. http://www.histpharm.org/ISHPWG%20France.pdf.

[49] LISTER M. A Journey to Paris in the Year 1698[C]//PINKERTON J, ed.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 and Travel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 Printed for Longman, Hurst, Rees, and Orme, and Cadell and Davies, 1809: 2-76.

[50] 蓝莉，张放. 路易十四 1685 年派往中国的数学家[J]. 国际汉学，2016(1)：26-48.

[51] 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 冯承钧，译. 北京：中华书局，1995.

[52] 杜赫德，编.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上卷[M]. 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53] 樊洪业. 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4] 杜石然，韩琦. 17、18 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科学的贡献[J].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3(3)：55-64.

[55] 韩琦. 康熙朝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活动[J].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2)：68-75.

[56] 李晟文. 明清时期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初探[J]. 世界宗教研究，1999(2)：51-59，156-157.

[57] 韩琦. 康熙皇帝·耶稣会士·科学传播[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

[58] RIVEST J. *Secret Remedies and the Rise of Pharmaceutical Monopolies in France during the First Global Ag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16.

[59] SMITHIES M. Tachard's Last Appearance in Ayutthaya, 1699[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02, 12(1): 67-78.

[60] TACHARD G. *Second voyage du Père Tachard et des jésuites envoyez par le Roi au royaume de Siam*[M]. Paris: Daniel Horthemels, 1689.

[61] 柯兰霓. 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M]. 李岩，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62] 博西耶尔夫人. 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M]. 辛岩，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63] LAUNAY A. 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aris[M]//MACERLEAN A A, WYNNE J J, SHAHAN T J, *et al*, eds.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4.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2: 79-80.
[64] TRUONG A. The Conflicts among Religious Order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J]. *Science Journal of Volgograd State University*, 2021, 26(5):57-71.
[65] 谢子卿. 17世纪法国和暹罗邦交过程中的巴黎外方传教会[J]. 南洋问题研究, 2015(1): 90-98.
[66] PENNÉGUÈS M. A Newly Unearthed Travelogue: Relation to Siam in 1685, by Jean Basset[J].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2024(1): 163-172.
[67] 李华川. 白日昇与十八世纪初天主教四川传教史[J]. 宗教学研究, 2014(3): 225-233.
[68] 许序雅, 许璐斌. 17世纪天主教修会对远东传教权的争夺[J].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10(2): 36-43.
[69] CHARBONNIER J. Appendix the MEP in China: A Chronolog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C]//LI J, ed.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MEP) and China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eiden / Boston: Brill, 2022: 245-268.
[70] 关雪玲. 清宫医药来源考索[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4): 19-26.
[71] 龙思泰. 早期澳门史[M]. 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72] 吴振棫. 养吉斋丛录[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73] 姚衡. 寒秀草堂笔记[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74] 严珍, 岳建军, 马小军, 何金荣, 张丽霞,杨春勇. 药用植物巴西吐根的引种繁殖及栽培初探[J]. 广西植物, 2021, 41 (11): 1889-1896.

A Western Medicinal in Kangxi's Court: *Xi-Bai-Ga-Gua-Na*, or Ipecacuanha, and its Journey Across the Globe

YAN Yiwei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A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 drug known as *xi-bai-ga-gua-na* (西白噶瓜那) used in Emperor Kangxi's (康熙皇帝) court was actually the South American medicinal plant ipecacuanha. It was introduced to Europeans through a book published in the Netherlands in the 17th century. It's popularity in France as a secret remedy surged from 1672 Shortly before exclusive rights of sale were granted for its preparation. Subsequently, its recipe was incorporated into both French and English pharmacopoeias. The effectiveness of ipecacuanha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French Catholic missions, leading to its provision to missionaries *en route* to the Far East. The French missionarie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of the 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s Paris, who were actively engaged in their country's overseas expansion activities, carried the drug from Paris to Beijing. Gerbillon, a French Jesuit, presented it to Emperor Kangxi between 1699 and 1704. Later, Portuguese merchants and Jesuits residing in Macau also presented it as a tribute to the court. According to the medical archives of the Qing palace, ipecacuanha was considered at least twice as a potential candidate for treating severe bloody dysentery, seemingly valued but infrequently use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rug into China was not prompted by any pressing need due to epidemics. A convergence of historical factors facilitated its journey across continents within three decades. Its limited utilization in the Qing court was determined by its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the disease spectrum of its destination area.

Keywords ipecacuanha; Western drugs; Kangxi Emperor; French Catholic missionaries; transmission of medicinal substances; medical exchanges; the 17th century